

# 古希腊自然哲学与民主政制的共生关系

## ——兼论科学民主的起源与认识论基础

章雁超<sup>1,2</sup>

(1.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114;2.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从编年史来看,古希腊自然哲学与民主政制有着明显的同兴共衰的历史关联。古希腊民主政制不仅让自然哲学产生所依赖的社会分工成为可能,还为各种自然观的争鸣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民主政制蕴含的分歧、妥协、公共参与等特质是构建古希腊自然观必不可少的过程要素。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就不同自然观的争鸣及融合表现出显著的民主特征,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民主的生动写照。以人为尺度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纲领是古希腊民主政制和自然哲学民主的认识论基础,但相对主义思潮的泛滥也产生了消极的政治影响。在反思、批判民主政制并重建绝对真理体系的过程中,自然哲学随着雅典政制的消亡而走向衰败。

**关键词:**自然哲学;民主政制;古希腊;同兴共衰;相对主义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N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4)04-0029-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4.04.004

###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in Ancient Greece: On the Origin and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Scientific Democracy

Zhang Yanchao<sup>1,2</sup>

(1.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ronicle, there is a clear historical correlation of apparent joint prosperity and decline betwee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the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 ancient Greece.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not only makes possible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on which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depends, but also provides a sui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contention and creation of various views on nature. Such features as difference, compromis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mocratic politics are indispensable process elements to construct the ancient Greek view on nature. The argument and fusion between/among different views from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s of nature has showed the remarkable democratic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become a vivid portrayal of nature philosophy democracy. The epistemological program of relativism based on human scale was the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its democratic government and

收稿日期:2024-02-21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项目(XSP22YBC529);湖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21B0351)

作者简介:章雁超(1987—),男,博士,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科学社会研究。

nature philosophy democracy, but the overflowing of relativism had also produced negative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process of rethinking and criticizing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of simultaneously rebuilding the system of absolute truth,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gradually declined with the demise of the Athenian politics.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nature; democratic politics; Ancient Greece; joint prosperity and decline, relativism

科学民主化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打开科学知识生产“黑箱”的重要成果之一,其源头可上溯至古希腊自然哲学与民主政制的共生关系。从编年史来看,古希腊民主政制与自然哲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同步关系。比如,梭伦当选执政官并着手民主改革之时,大致是泰勒斯等自然哲学家登场的时候;庇西特拉图担任僭主并深入推进民主改革的时期,毕达哥拉斯和克赛诺芬尼等人开始引领各自学派;克里斯提尼建立较完备的民主政体之时,也是赫拉克利特提出“逻各斯”这一重要科学认识论的时代;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民主走向鼎盛之时,恰逢德谟克利特创立代表古希腊自然哲学最高成就的原子论。直到某种关于“存在”与“一”的形而上学知识体系成为教权垄断信仰阐释的理论资源后,早期科学民主便随着自然哲学的衰败而衰亡。古希腊民主政制与自然哲学“琴瑟和鸣”的历史表明,古希腊日渐繁荣的自然哲学与其所根植的民主政制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

## 一、古希腊民主政制的兴起及特征

### (一)古希腊民主政制的兴起

民主政制发源于古希腊城邦时代。在文明史的研究中,一般土壤肥沃的大河流域以及广阔的平原被视为建立长期稳定和庞大复杂君主制国家的必要条件,而这种所谓必要条件恰恰是古希腊和小亚细亚地区所缺乏的。连绵不绝的山脉不仅限制了古希腊农业的发展,而且还把大片疆域分隔成了难以相通的小块土地,这导致古希腊先天缺乏那种可以作为地区合并之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sup>[1]</sup>。原始农业处于“看天吃饭”的阶段,一旦遇上收成不好的年景

就意味着民众的饥荒。自耕农不得不以土地为抵押物向富人借钱、借粮或借种子,自耕农和地主之间由此形成债务关系。

恩格斯指出,“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以地租的形式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么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sup>[2](P128)</sup>城邦不同群体经济地位的变化导致其政治地位的变化,权力日益集中到少数贵族手中。权力与财富的结合必然产生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马太效应”,贫富矛盾的激化导致城邦政局动荡不安,使社会走向了革命的边缘。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雅典不可避免地走向权力分配正义的民主改革。

梭伦主张对中下层民众让步,使之享有一部分政治权利。为了保障雅典公民的政治权利,梭伦立法禁止以人身作为担保的借贷,以免雅典公民因债务沦为无法行使政治权利的奴隶。庇西特拉图以迎合平民的方式获得了受压迫平民的支持,从而建立僭主政治,他将顽固的贵族流放海外,给平民分配土地、让其自食其力。克里斯提尼以“贝壳放逐法”约束官吏,即公民可以用贝壳记录滥用职权的官吏,被多人记录的官吏将受流放之刑。伯里克利将公民大会变成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所有公民通过投票参与社会决策,由此,城邦权力从少数贵族寡头手中转移到全体公民手中。至此,雅典民主政制走向鼎盛,成为古希腊社会制度的典范。

从本质上来说,雅典政制是一种奴隶主的民主政制。尽管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有参与管

理国家的权利,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实际享有民主权利。恩格斯估计,“到了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万人,而男女奴隶为365 000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放的奴隶为45 000人。”<sup>[2](P135)</sup>大量奴隶的存在,使得除却无权参政的妇女、儿童之外的少数男性公民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城邦政务中来<sup>[3]</sup>。这种奴隶主的民主制度不仅使早期自然科学得以产生,而且为当时自由争论氛围下不同思想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 (二)古希腊民主政制的特征

古希腊民主政制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分歧”。希腊城邦的无国家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各种分歧成为普遍的社会常态。民主制度下的平等主义原则是导致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古希腊人将政治视为一种类似竞技比赛的零和游戏,以求得个人荣誉的最大化<sup>[4]</sup>,但这种平等主义原则压制了那些比普通公民更优秀的精英群体为政治地位和政治荣誉而进行的公开斗争。公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是产生分歧的另一重要原因。富人无需忙于生计,他们有时间接受教育、有机会成为知识精英甚至成为思想家,穷人则为了生存被迫时刻劳作,很难有时间和机会接受教育。由此,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且这成为他们为数不多的一个共识。

古希腊民主政制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通过“妥协”达成一致,以求兼顾处于冲突和争论中的各方利益,从而维系城邦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在古希腊民主诞生之初,富人和穷人两大群体不断爆发激烈冲突。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妥协是维系权力平衡的关键手段。解除穷人债务是梭伦在穷人和贵族之间寻求妥协的一种典型手段,他既不赞成穷人通过极端方式获取贵族的土地,又严厉抨击贵族对穷人贪得无厌的剥削和压榨。梭伦改革的最终结果是两边都不讨好——贵族因梭伦取消穷人的债务而对他心生

不满,穷人则希望梭伦制定新的法律重新分配贵族的财产。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他宁愿遭受双方的仇视,也要采取曾是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sup>[5]</sup>

古希腊民主政制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在城邦事务管理中,强调不同阶级和群体的“公共参与”。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是“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sup>[6](P111)</sup>，“居住权利和诉讼权利,或公民的后裔,都不足以构成公民的身份,政治权利才是公民资格的真正条件”<sup>[6](P440)</sup>。所以,我们可以从雅典的民主改革中看到这样的趋势:从寡头统治到九执政官和公民大会、议事会规模从四百人扩大到五百人、从单一军事执政官到十将军制度等,这些民主改革皆以扩大城邦事务及其决策的公共参与范围为依归。事实上,强化公民的参政责任与义务,不仅是古希腊民主政制的体现,也是协调各方利益、维系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发展的必要举措。

从古希腊民主政制的典型特征中,我们可以大致刻画出一种理想的民主状态,即在对城邦政治生活公共参与的基础上,公众若因自由发表意见而产生的观念分歧与冲突,最终可以通过磋商、说服和妥协等方式达成统一。古希腊民主政制的特征和传统延续到人类认识自然的领域,就促进了自然哲学的兴起与发展。在民主的社会氛围中,公民可以对自然现象和问题自由地表达不同的观念。在化解观念冲突的过程中,人们主要依赖协商、论辩、说服和妥协等手段,而不是通过权威力量的干预或话语强权的压迫来达成共识。

## 二、古希腊自然哲学产生的政制前提及其繁荣发展

亚里士多德曾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研究,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



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寻找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定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sup>[7]</sup>亚里士多德这段话道出了研究自然哲学的三个必要条件,即惊异、闲暇和自由。若以这三个条件来衡量当时的社会,不难发现正是古希腊独一无二的社会政治环境孕育了自然哲学。

人们之所以能够不因任何利益驱使而自由探索,并获得一种几乎没有实用价值的关于世界的知识,首先是因为人们在好奇心驱使下的求知欲,这种“无用之学”的展开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政制前提。在古希腊,家庭奴隶承担了繁重的生产劳作和繁琐的家务事,因而奴隶主能有大量闲暇时间研究科学、思考自然。“惊异”和“闲暇”,是自然哲学诞生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并非只有古希腊奴隶主具备这样的条件。同时代东方文明古国的特权阶级同样拥有“闲暇”这个条件,而对自然的“惊异”似乎是人类的共性。但“惊异”和“闲暇”只有与“自由”相结合,才能构成自然哲学诞生于古希腊的必要充分条件,而古希腊独一无二的奴隶制民主政制正是这种“自由”的源泉。

恩格斯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繁荣,使古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sup>[8]</sup>而古希腊民主政制又为自由思想和自由论辩提供了相对包容的社会条件,使自然哲学能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与融合中向前迈进。可以说,正是古希腊民主政制催生了古希腊自然哲学。政治宽松的社会条件为自然哲学家提供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学术环境,促进了各种新思想的萌发、表达与传播,由此,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开始走向群星闪耀、各领风骚的繁

荣时代。

泰勒斯被视为古希腊自然哲学开创者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他首先以全称命题的形式表述了水本原的自然观。作为科学知识的基本表述形式,全称命题便于人们就异质性观点展开有条理的智慧交锋。将万物统一于某种特定存在意味着承认“一”就是智慧,而智慧之间的高低真伪之争比无的放矢的争论更有意义。例如,我们可以说全称命题“所有S都是P”,这对增进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要比“某些S是P”或“一些S不是P”更有积极意义,后者作为特称命题容易使严谨的学思论辩陷入混乱的市井争吵。泰勒斯之后,自然哲学家们围绕万物的本原问题提出了各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从这些迥异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分歧与争论。

第一,关于“无形”与“有定”本原的论辩。例如,阿那克西美尼和第欧根尼认为,气先于水而为万物之原始基质。他们与泰勒斯的共同之处是将某种具体的感性存在当作世界的本原。毕达哥拉斯则以“有定”之物作为世界的本原,他将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数”这种抽象的规定。赫拉克利特则以“火”和“逻各斯”调和了关于本原的两种争论,“无定”的“火”按照“逻各斯”的规定有分寸地“燃烧”与“熄灭”。

第二,关于“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论。在早期自然哲学中,人们曾以各种单一基质说明万物的由来,但都面临着“一”无法说明“多”的困境。因此,恩培多克勒提出了“四根说”,他将水、火、气、土四种元素共同作为世界的基质。在此基础上,德谟克利特则以数量无限却又具有单一性质的“原子”调和了“一本原”与“多本原”之间的争论。

第三,关于“变化无常”与“不变不动”的动静之争。爱菲斯学派强调一切事物处于普遍的运动变化与相互转化之中,如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他的学生克拉底鲁将这

种思想发挥到极致并声称,“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爱利亚学派则坚持以某种“不变不动”的存在作为万物的基始和根据,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认为,处于流变中的事物既无定形又转瞬即逝,这种变化无常的东西不能是其所是——当我们说它是什么时,它就已经不再是什么了。

第四,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本体论之辩。巴门尼德将“不变不动”的抽象“存在”作为通向认识世界的“真理之路”,将瞬息流变的感性称为通向“意见之路”的“非存在”。高尔吉亚则通过归谬法否证了“有物存在”的观点,反证了“无物存在”的真理性。柏拉图则以“理念”与“现象”调和了“一与多”“不变与流变”“存在与非存在”“真理与意见”等范畴的矛盾,将前者视为后者存在的根据,并以不同等级的普遍“理念”说明众多具体事物。

第五,关于“同类相知”与“异类相知”的认识论之争。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和德谟克利特的“影像说”属于典型的“同类相知说”。赫拉克利特凭借其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意识到由矛盾和斗争引起的运动变化是我们形成认识的前提。阿那克萨戈拉认为,只有性质不同的物体才能相互作用,进而产生变化,而相似的物体之间彼此不发生影响,如我们不会对温度相同的物件有冷或热的不同触感。

以上自然观和认识论上的纷争不仅存在于不同学派之间,而且存在于亲密的师生关系之中,如高尔吉亚熟练地运用他老师芝诺的逻辑论证方法,反过来批判芝诺为其坚持的自然哲学信念所作的辩护。亚里士多德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由,批判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理念论”。总体来说,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之间的自由表达和观点争鸣表现出显著的民主特征,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民主的生动写照。民主政制造就的宽松社会环境使得人们对各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进行自由论辩成为可能,而这种自由论辩

促使自然哲学在辩证扬弃与融合创新中不断发展。

### 三、“民主争鸣”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基础

随着古希腊民主政制日渐成熟,不同流派的观点争鸣逐渐成为民主生活的常态。传统的文学、音乐、绘画、几何等方面的教育已不能适应经济与政治的蓬勃发展,时代迫切需要人们提升演说、修辞、辩论、诉讼等与从政密切相关的能力。民主水平的提高和自然哲学的发展共同提升了人们的思维能力,自然知识生产从朴素的宣称论断逐渐转向严密的逻辑推理。一些人在自然观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又似乎都能自圆其说,这动摇了人们对获得绝对真理的信心。人们面对同一世界何以产生相互矛盾的观念?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导致其关注点从自然转向人自身,由此开创了相对主义认识论研究的先河。

休谟曾指出,“一切科学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就算是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sup>[9]</sup>这表明,基于自然的科学实践和认知归根结底是具有主体间性的人的活动。因此,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在民主论辩中占据优势地位,雅典城邦的一些知识精英开始将人的思维方式朝着感觉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方向推进,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树立并强化相对主义的真理观。

作为智者领袖,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认识论纲领,把认识的尺度归化于人,将原本外在于人的“逻各斯”内化于人,各人依据自己的“逻各斯”去认识事物,改变了爱利亚学派基于永恒存在而将真理绝对化的作风,凸显了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在此基础上,普罗

泰戈拉进一步提出“一切理论都有其对立的说法”。通过发掘事物的对立关系,普罗泰戈拉发展了最早的主观辩证法,以服务城邦民主生活中的观点论辩。依此思路,人们很容易得出“理论无所谓真假”的结论。虽然面临着致命的反身性问题,但是该命题却是古往今来不同流派争鸣的一个重要根源。

后来,高尔吉亚将普罗泰戈拉开创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推至极端的不可知论的境地。借用芝诺的归谬法,高尔吉亚提出了三个命题:一是“无物存在”;二是“即使有物存在,也是不可知的”;三是“即便存在可知,也无法表述”。早期的自然哲学家相信人能够认识外部世界,高尔吉亚却认为人无法认识外部世界,他认为一切认识只是人们凭主观感受自说自话。普罗泰戈拉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和高尔吉亚的不可知论的共性在于:前者用“一切皆真”的相对主义、后者以“一切皆假”的怀疑主义解构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论,阻断了人们通往“真理”的道路。所以,在古希腊民主生活中,没有什么观点不可以而论辩中被反驳。

以人为尺度的认识论纲领折射了伯里克利民主时代的人文精神,形成了思想自由和民主论辩的社会风气。不过,当城邦民主制度开始由盛转衰时,相对主义的“智慧”可能堕落为一种罔顾事实的诡辩技巧,变成权贵阶层操弄城邦政治生活的工具,也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与伦理道德秩序混乱的认识论根源。为防止相对主义思潮泛滥并挽救城邦的道德生活,一些思想家在对抗智者的反驳中超越了他们的观点,为绝对真理重新确立了形而上学的依据。不过,绝对真理观的确立使他们对城邦民主和公民参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反感。

#### 四、古希腊民主政制与自然哲学的共同衰落

民主雅典的繁荣为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兴盛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作为自然哲学最高成

就的“原子论”就是伯里克利时代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结出的硕果。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sup>[10]</sup>原子论中表述的无数具有能动性而不受他物支配的、构成世界的最小单位且不可再分割的“原子”,实际上是对那个时代城邦民主政制生活中自由公民这一个体的隐喻。不过,当一个时代达到鼎盛之时,实际上也预示着它将迎来历史的拐点。

极盛的雅典凭借海上霸权向外积极扩张,逐渐威胁到斯巴达的陆上霸权,并最终引发了残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长达27年的战争重创了整个古希腊,给古希腊民众带来了空前苦难:过去从没有过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破坏,从来没有过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全希腊各地区到处是旱灾和饥荒,而严重的瘟疫又极大地加重了战争造成的创伤<sup>[11]</sup>。战后的萧条使古希腊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社会财富越发集中,而自由公民变得日益贫困。古希腊公民大会逐渐沦为“意见领袖”操控政治、排斥异己的工具,并最终导致了所谓的“民主暴政”。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这种曾被作为典范而加以推广的民主制度。

作为民主政制的簇拥者,德谟克利特认为,在民主制度中遭受贫穷之苦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的幸福要好,正如自由比被奴役要好一样。但这种制度安排忽略了专家和专业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导致看似美好的制度安排在政治实践中存在严重问题。或许是出于对这种民主政制的强烈抵触,柏拉图甚至想把他所能搜集到的德谟克利特的全部作品都用火烧毁<sup>[12]</sup>。柏拉图在其作品中讨论过几乎所有的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却一直绝口不提德谟克利特,甚至在应该反对德谟克利特



观点的章节也对其避而不谈。从柏拉图极力反对德谟克利特的那一刻起,就预示了自然哲学的衰落。当柏拉图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理念论”开始主导欧洲哲学界时,以“原子论”为代表的基于唯物主义传统的自然哲学的生存空间就必然越来越小。

在柏拉图基于“理念论”构建的政治理想中,所有王国的权力掌控者都应该是掌握知识和真理的“哲学王”。柏拉图认为,只有在正确哲学的指导下才能分辨是非和正义,因而,只有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才能让城邦治理体现出真正的正义。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理想的城邦政治生态设计为三个阶层,即治国者、护卫者、劳动者。其中,治国者只能由掌握真理的哲学家担任。柏拉图认为,如果将治理国家的权利平均分配给所有人,就违背了“善”的原则,因而是非正义的。由此可见,柏拉图实际上崇尚的是一种典型的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贤人政制”。柏拉图坚持认为,国家应由德才兼备者掌管,而不应该像民主制那样安排平庸之辈集体掌控国家。

柏拉图认为,与之相应的,科学王国中的“统治者”也应该是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人,即掌握科学解释权与决策权的科学王国的“统治者”只能是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专家。对于不具备相关智慧的人而言,除了服从权力的安排之外,就基本没有其他的政治权利了。而造就这些具备相关智慧的“统治者”的关键在于教育。柏拉图论述的“日喻”“线喻”和“洞喻”给我们这样的谕示:教育的目的是将灵魂从可见的现象世界往上提升,实现灵魂从意见到真理的转向,从而认识真实的理念世界。不过,对具备相关智慧的“统治者”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即他们的灵魂转向必须是双向的。他们既要实现灵魂上升到理念的转向,直至掌握作为终极真理的理念,又要重新下降到“洞穴”帮助无知的“囚徒”也实现灵魂转向,使他们成为王国的好公

民。这意味着科学王国中的公众如同愚昧的“囚徒”,只能听从掌握科学真理的专家指导。

至此可见,柏拉图建立的这个宏大的唯心主义的“理念论”体系不仅强有力地扼杀了任何形式的民主政制,而且“理念论”所蕴含的绝对主义思想,取代了推动形成自由辩论和民主争鸣社会风气的相对主义。在整个古希腊晚期和古罗马时期,影响哲学发展的人主要是柏拉图,甚至中世纪的教父哲学和早期经院哲学也是以柏拉图的思想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这就导致基于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中断了长达千年之久。在缺乏自由民主社会氛围的教权时代,自然哲学必然走向衰落。这一理论逻辑也符合自然哲学在不久的将来被宗教哲学所取代的历史现实。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对雅典民主的反对态度,他在《政治学》中区分了五种民主政体:一是严格按照法律、遵循人人平等原则的民主政体;二是以低微的财产门槛确定公民具有出任公职资格的民主政体;三是由出身干净的公民出任公职并依法执政的民主政体;四是凡公民皆能出任公职但仍需依法执政的民主政体;五是公民皆可受职但以民意代替法律裁决政事的民主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第五种不以法律为最高权威的城邦民主是导致平民领袖产生的根源。当平民意志在其领袖蛊惑下挣脱法律束缚而转化为统一意志时,平民领袖如同不受法律约束的君王,民主制也将蜕化为僭主制<sup>[13]</sup>。在“民意大于天”的极端民主制中,“公众裁决”的原则使那些学有专长的专业执法人员无法作出正确又高效的决定。“民主”常常沦为政客操控政治的工具,并使他们拥有罔顾法律的特权。

亚里士多德崇尚法治,法律在其政治学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以质料与形式说明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前者决定事物的存在,后者决定事物的发展。在事物等级序列中,高级事物

作为形式吸引着作为质料的低级事物向上发展,并规定它应该如何向上发展。所谓“法律”,不过就是规定作为城邦质料的公民应该如何向着高级阶段的理想城邦发展的法则。因此,构建理想的城邦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原则就以法律裁决替代公众裁决。受这种政治观的熏陶,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学生亚历山大在建立马其顿王国之后,终结了古希腊民主政制。此后,不仅古希腊民主政制沉寂了,而且自然哲学也由此走向衰落。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古希腊的民主政制与自然哲学之间都表现出一种同频共振、同兴共衰的关系。自然哲学兴起于雅典民主政制改革的初期,并在古希腊民主政制的鼎盛时期取得了“原子论”这样的最高成就,此后,又随着古希腊民主政制的衰落而衰落。可以说,如果没有民主政制及其营造的自由与开放的社会氛围,就不会有作为早期科学的自然哲学在异质性观点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中的持续迈进。在自然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面对同质性的自然得出了具有明显张力的异质性结论。对于这一现象,由智者运动引发的相对主义思潮给出了合理的解读。可以说,相对主义是科学与民主相结合的重要认识论基础。没有一定程度的相对主义,就没有认识的主体间性;没有认识的主体间性,就没有自由争鸣的空间,也就没有民主协商的必要。

### [参考文献]

- [1]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M].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2.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3] Economou E M L, Kyriazis N C, Platias A. Democracy in times of crises: challenges, problems and policy proposals [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22: 171.
- [4] [英]克里斯托弗·罗, [英]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M].晏绍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8-29.
-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3.
- [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96.
- [9] [英]休谟.人性论(上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7.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20.
- [11]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8.
- [12] 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95-96.
- [13] 董波.亚里士多德论民主[J].世界哲学,2019(6):25-33,157.